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39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39 ·

中國文化問題研究

陳高傭著

迎中國的文藝復興

李長之著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吳世昌著

文化建設論叢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
會文化建設運動委員會編

現代學術文化概論（第一冊）

竺可楨等著

現代學術文化概論（第二冊）

梁方仲等著

上海書店

李長之著

迎中國的文藝復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上海初版

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一冊

(·8363泥報紙)

定價國幣貳元陸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李長之

發行人 李宜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分館

版權翻
印必究

自序

有人寫序文，在書成之後；有人寫序文，在書成之前。我這次寫序文，却是在書成之間。

這書的名字，變化了許多次，這書的形成，也經過了不少時。

就在蘆溝橋事變剛發生後的十幾天，我離開了北平，日子是二十六年七月二十號。我那時一方面懷了一個渺茫的幻想，以為事情幾天就會過去，一方面又下意識地認為一時恐怕沒有了局，在忽迫與焦灼中，我把應用的書稿分了兩類，一類是必需的，我想儘可能地攜帶，一類是次要的，就想丟棄。誰知既經上了車，去檢點時，才知道裝錯了，必需的書稿反而遺下。我懊惱萬端，所以一離北平就想恢復我的藏書和一些寫作大綱。但是當我在濟南的寓所裏坐定下來了的時候，却並沒有怎末動手。

一直到八月十一號，這已是上海大戰的前夕了，我應約到昆明去，於是重上了征途。這次在南下的車上，空氣十分清爽，腦筋也格外清醒，因而就鋪開紙，重新想恢復我一些已失的思想頭緒了。首先寫出的是「文藝批評之根本原則」一書內的一些小題目，自己覺得很高興。而且那時想，沒有參考書和底稿倒是一個大解放，我自己可以自由地把幻想馳騁下去。又要想恢復「孟軻之學」一書內的什末節目，却終於有些茫然。然而不期然而然地，却寫下了三個大綱：一是「論國家情感」，二是「國防文化與文化國防」，三是「文化之根本原則」。

這都是二十六年八月十一號在車上的收穫，但有的到最近寫成文章。——現在說話，是已超過了五年了。

我在八月十二號到了南京。次日即是八一三。十五號，南京開始遭到空襲。這時我沒有在車上時那末悠閑了，既沒寫作，也沒繼續思索。十九號是南京遭受空襲頗為嚴重的一天。我看到由南京到上海而香港而昆明的路線已經無望了；於是在二十號即離開南京，轉往漢口。自此由粵漢路直下，到了廣州，取道香港，搭輪赴海防，由海防到了昆明。到昆明的時候，已經是九月七號。這一路上，都因為擾攘不寧，一個字也沒計劃。在昆

明差不多一年，除了把「文藝批評之根本原則」時時有所補正，覺得比在北平所思得的或者還完備些以外，其他任何思想工作也沒進行。以前在車上寫下的那三個大綱，也還沒動筆寫成文字，只是有時自己翻出來呆看一下，又收起來而已。至於我要恢復的書籍更可憐，只恢復了五種，只是幸好這其中有邁爾泰（*Dilthey*）那本可愛的名著「生活體驗與文藝創作」（*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有席勒的「哲學論文集」，有萊辛的「拉奧孔」，多少解了點悶。

在二十七年的五月二十九號，我離開了昆明，每在旅行的時期，我的思想總是活潑些。途中重讀「論語」數過，一方面感到「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的偉大，一方面感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的深切，前者給我鼓勵，後者使我戒懼。我同時也便重想到許多文化問題。「國防文化與文化國防」這題目便重又跳在我的心頭了，我深切覺得偏頗的殺人的國防文化害了多少人，中國的讀書人都應該勉為文化的長城，負起文化國防的重責，讓文化國防是目的，國防文化是手段，本末千萬不可倒置，倒置了就會把文明的二十世紀又驅入中世紀了！在我到達了貴陽，在貴陽留住了十來天的時候，逢巧傳道諸兄創刊「建國評論」，遂促促間把此意寫成。這可以說是現在所收的這集子中最早的一文。作的日子是二十七年六月十二號，執筆於嘈雜的小旅館裏。

我於是打算就「文化國防」一個題目寫下去，成為一本小書。那些基本觀念，到現在並沒有變：如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如對於五四文化運動的估價，如對於未來的文藝復興的期待等，都是。

這一年的七月，我經過重慶，到了成都。當時便計劃着續寫「如何建設文化國防化」，其中一部分意思就是後來所寫的「論國家民族意識之再強化及其幾個具體方案」。

同年十一月，我又回到重慶，一直到現在，很少移動過。這其間所寫的文字，除了關於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者外，就是多少以這個基本問架為出發了。

但是當我慢慢看到，不，是意識到，中國的抗戰已經勝利在望了，於是想到戰後的一切建設。在那百廢待

舉之際，文化的建設豈是可以忽略的！在我們這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的人，似乎至少應該對文化建設的問題貢獻一點意見。這樣一想，便一度想把書名改爲「建設的中國文化論」。然而覺得太泛，代表不了著意。我的中心意思，乃是覺得未來的中國文化是一個真正的文藝復興。五四並不够，它祇是啓蒙。那是太清淺，太低級的理智，太移植，太沒有深度，太沒有遠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們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將來的事實也不會如此。在一個民族的政治上的壓迫解除了以後，難道文化上還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從前的光榮相銜接嗎？現在我們應該給它喝路，於是決定名我的書爲「迎中國的文藝復興」！

我曾經向許多青年，熱切地說過我這願望。我願意我指出的這文藝復興的徵兆終於不虛！

我在五年前車上所寫下的大綱，現在都多半發我成文字了。那恩索的開始，方是大戰的開始，現在書將完成，也是勝利將要完成的時候了。我的朋友吳組緝兄曾勸我不要寫這類的「政論」文章，是的，我這一套的意思發表完了以後，我就一定告一結束，還是專治自己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了。然而對於中國的文藝復興的期待的熱情卻是決不會冷卻的。

三十一年九月九日，長之記

目次

自序

一、論如何談中國文化	一
二、國防文化與文化國防	九
三、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	一四
附錄一：評新理學	二三
附錄二：評新事論和新世訓	三六
附錄三：評新人生觀	四五
四、中國文化運動的現階段	五三
五、中國文化傳統之認識上：儒家的根本精神	五九
六、中國文化傳統之認識中：古代的審美教育	六六
附錄：緬懷文化城的北平	七五
七、中國文化傳統之認識下：中國人的人生觀之缺點	七九
八、文化上的吸收	八四
附錄一：論翻譯工作	八八
附錄二：柏拉圖對話集的漢譯	九二
九、戰爭與文化動態	一〇〇
附錄：再論戰爭與文化動態	一〇五

十、精神建設：論國家民族意識之再強化及其方案	一一〇
十一、輿論建設：論思想自由及其條件	一一六
十二、思想建設上：論思想上的錯誤	一二〇
十三、思想建設中：大時代中學者應有之反應	一二八
十四、思想建設下：論大學教育之精神	一三〇
十五、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國	一三二

迎中國的文藝復興

一 論如何談中國文化

文化問題，是人人可以有意見發表的問題；却正因為人人可以有意見發表，所以上智下愚的書法，有時便不容易分別。糊塗和奧妙，晦澀與含蓄，耳食與獨得，迂腐與正大，都往往相去一間，在抗戰以來，談中國文化的特別多，這些談中國文化的論調之中，精采的固有，「魚目混珠」的也確實不少了。

如何才能分辨何者是珠，何者是魚目呢？這要看三方面：一是態度，二是技術，三是知識，詳細的說明在下面。

二

在態度上，我們要求的是：第一，不能把問題看得太難或太易。看得太易的人是隨便說話，說些捕風捉影，隔靴搔癢，不三不四的話。這樣的結果，是使人對於那些真正有洞見，有根據的論調也不樂意去睬了。看得太難的人，則是自己不說話，又不讓別人說話。他們說文化問題是根本不容易談的，談也不能得什麼結果。這影響便是封閉了探討的通路。我們認為，文化問題當然可以談，但是不能隨便談。誠然我們不能把文化中的各部門都點點滴滴地一絲一毫涉獵遍，然後再去綜合，這樣便真正是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

殆已」(莊子養生主)了。但是一葉知秋，究竟也還是可以作到的。大凡我們研究文化問題，總要有哥倫布那樣本領，看見一點木片，就可以推測出一個大陸來，文化上有許多現象，我們可以覺而知之，正如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上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斷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賢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如何，而其言之字裏行間，皆有此精神之瀾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不過可注意的是「善讀者」這三個字，這就是並非不可談，但又不能隨便談了，在任何學術的討論上，懷疑主義者和獨斷主義者都是不能成事的。文化問題不是例外，我們希望的是，有慧心而又有耐心的人，以高度的綜合能力，配合上縝密的思考，復加上學識，然後再給我們談文化問題。

第二，我們要求不要預存主奴之見。妄自尊大固然不好，處處覺得下人一等也不必。我們要求公平！對別人公平，對自己也要公平。不必遮掩，不必庇護，也不必作虛偽的謙卑！妄自尊大是一種冬烘式的頭腦，這種頭腦最不堪一擊，就是那自尊心也是非富脆弱的，一旦幻滅，就會一變而為自卑了。處處覺得下人一等則是一種「高等華人」式的姿態，說得再不客氣一些，就是一種洋奴的身份而已，他所衡量中國文化的，只是從居室的衛生設備，或者服裝，或者刀叉(而不是筷子！)或者幾句洋涇浜上來立論，于是看到中國的使只有愚，貧，憐，弱，私……了。冬烘的毛病是妄，妄是一個趨於極端的表现，因此便很容易從這個極端一變而為另一個極端。所以我說他們容易由自尊變為自卑。變為自卑當然也不好，然而經過一番反省，對人對己都未始不有少許益處。「高等華人」則不然，他們的毛病是淺，淺是不會有什麼轉變的。因此，「高等華人」式的文化觀於己於人遂都無甚助益。而且妄的人，使人容易覺察他的錯誤，淺的人就容易蒙蔽一般人。可見「高等華人」式的文化觀之為害，殆尤甚於冬烘式。自尊者妄，自卑者淺，我們既不要妄，更不要淺，妄和淺的最大壞處，就是不容易得到事情的真相。一般談中國文化者之不得中國文化真相，坐於此者止不少。章學誠說：「是非只欲其平，不欲其過」，妄和淺是都容易過的！

第三，我們要求說明與價值分開，價值與「是否可仿效」也要分開。一般人在這點上常不能辨析，例如以

爲孔子是封建時代的人物，所以他沒有價值了，殊不知孔子之爲封建時代的人物只是一種說明，說明是並不指高下的。價值的標準却是另有所在的。試看同是封建時代的人物，何以並非人人都和孔子一樣偉大呢？其他各方面的說明亦然，或則闡明其地域，或則解釋其種系，或則陳述其交游，這都與孔子的本身價值無關。說明只關係事實，其中本無價值判斷，亦並不能作爲價值判斷的根據，又有人以爲有價值的就是應該去仿效，或者應該再現的，這也是不對的。這是因爲一事之是否該仿效，是否該再現，是除了那件事本身的價值問題之外，還另有許多因素，這些因素乃是在從前那件事初發生時所並不一定存在的，例如文言文和律詩，我們一方面要承認它的價值，文言的價值在以人工語言代替自然語言，而能達到純形式的藝術的地步；律詩的價值則在發揮一種建築性的美，但我們另一方面却殊不必因此就去拚命提倡文言文，拚命作律詩，這是因爲好些其它因素爲以前所不存在者現在是存在了。我們的社會變動了，文化姿態改換了，我們沒法給文言文再打強心劑。文言文的前途既暗淡，律詩就難以維持。然而我們却非因此否認文言文和律詩的價值。在普通人於此每每混淆；或則認識一種東西的價值，即以爲我們應該重作；或則因爲發現了我們不能重作，即否認其價值。其實：價值是價值，可否仿效是可否仿效。沒有價值的，固然不值得仿效，有價值的，却也不一定都可以仿效。總之，說明，價值，可仿效，乾脆是三件事。假若這三者混淆，就沒法談文化問題。說明要客觀，從說明而定價值，則評價不切實。說明是不免沾滯於事實之內的，評價却需宕居高臨下，站在離子之外。因此由評價所定的說明，那說明不免歪曲；據說明所作的評價，那評價常失之浮淺。至於是否可仿效，須要顧及實際，因此假若由評價而定仿效與否，使不免忽略許多實際牽掣，從前人所謂迂闊，正是此類；假若由可仿效與否而定價值，則蔽於實際，所得不免鄰近。我們不反對綜合，但是反對混淆！觀點的混淆，尤其是一切理論的致命傷。

以上三者，都是關係態度的。

三

在技術上，我們要求的，則是：

第一，談一國的文化時，須就其最高的成就立論，而不能專就低處看。文化是人類精神活動的最高的也是最後的結晶，只有這，才是文化。假若像戰前那個日本人內山完造所著的「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似的，只知道杭州人之隨地便溺，只知道中國人喜歡拿回扣，還談什麼中國文化！無怪乎日本人對於中國文化始終隔膜，無怪乎這書由小流氓尤炳圻譯了過來；只是我不懂為什麼書局還銷售這本書，政府也不禁；假若只從低處論文化，恐怕法國的文化只剩了咖啡座，德國的文化只剩了笨總差（像屠格涅夫的小說所描寫），英國的文化只剩了煙斗！這樣當然不是我們所要求的。我們所據以衡量法國文化的當然是笛卡爾與盧騷，據以衡量德國文化的當然是康德與歌德，據以衡量英國文化的就是牛頓和達爾文或者莎士比亞了。談中國文化時又何獨不然？我們不談則已，談就必須就孔子屈原司馬遷杜甫李白吳道子王羲之朱熹倪雲林王陽明……等人所成就的看，決不能就一般沒有知識，沒有教養的人的成就看。站在高級，可以了解低級；站在低級，却不能夠了解高級，我們把最高的成就明白了，對於許多通常的平凡的現象，倒末始不可以更容易地把握其意義。反之，却一定大有困難。從兒童的生活而推成人，從初民的生活而推文明人，從下等動物而推人類，這都有不可避免的危險。然而這些危險都多少還有學術基礎。至于像內山完造那樣，就不知道荒謬到什麼地步了！

第二，看一國的文化時，當用望遠鏡而不當用顯微鏡。原來有許多事情，太逼近了，反而不容易瞭然。只有在某一種距離上，才可以窺見全豹。就空間上說，當我們逼近一個較大的對象時，往往只看見其一枝一節，假如要得到那輪廓，是非站在某一種距離上不行的。就時間上說亦然，所以凡是沒構成歷史上的距離的事件，我們都很難以把握真相，許多人講文化，往往用顯微鏡的方法，結果就會只見枝葉而不見樹，見樹而不見林了。殊不知文化是一個大問題，必須放在某一個距離上，然後用望遠鏡去看，才能得到它的整個面貌和遠景。地球是圓的；但這也以月蝕時反映在月亮上的地形為最顯，假若只斤斤於目前所踏的一二尺地面，又如何能見其圓？

第三，涉及的方面當力求其廣。文化是有機的，是有統一性的，它表現於許多方面。讀文化的人，應該把這各方面都貫串起來。例如假若我們不明白魏晉時的人的談話裏是那樣簡括玄澹，我們如何能明白陶潛的詩之「文雖省淨，殆無長語」？假若不知道當時的胡僧像戶與窟多羅之高僧蒲澹，我們如何能知道所謂魏晉人風度的來源？宋人的詩那樣平淡，假如不看當時的山水畫以及瓷器，又如何能曉得？

第四，綜合的能力當力求其高。換一句話說，這就是需要哲學的頭腦。涉及的方面既廣，就容易泛濫而無歸，所以必須有一種統攝駕馭的氣魄。散漫的事實是沒有價值的，價值在貫串這些散漫的事實之後的意義。尋求意義，就必須有一種哲學訓練。

第五，討論文化時當分別何者為偶然的現象何者為必然的現象，我們的理論當建築在後者而不是前者。柏拉圖在講婦女問題時，曾這樣說，假若男女的不同，只是像一個禿頭的人和一個不禿頭的人那樣偶然的不同，那麼，他們所負的責任就不該不一樣了。這是一句很可解頤的話。我們探討文化問題時，更該注意這一點。假若所根據的全是偶然成分，那就很容易立論不穩。

以上五者，都是關係技術的。

四

最後在知識上，則我們要求：

第一，談中國文化，必須先懂得西洋文化。這是因為否則就不會知道何者是一般的現象，何者是中國所特有的現象。假有一件事情是各民族所共有的，而猶以為新奇，豈不可笑？否則明明為中國所特有，但是猶以為是一般的現象，那豈不也可惜？具體地舉幾件事說：例如中國古書在從前是不加標點的，但這不是中國所獨有的現象，西洋中世紀的古書也都是不加標點的。又如中國過去女子的生活是以家為中心的，知識也是很有限的，其實古代希臘也是一模一樣，所以許多人要談心時只好求之於年輕美貌的男孩。再如醫學，中國有些八動

輒說中國的醫學的特點是從人的整個出發，而西洋人的醫學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用藥方面，中國的藥是整個的自然物，如川貝母，甜甘草，而西洋的藥則為分析的，提煉的：殊不知在希臘名醫希波克拉提斯時代的醫學，觀點也是從整個人出發，用藥也是用自然原物，而不加分析提煉。更如常有人說中國人不守時候，沒時間觀念，這也是冤枉的，原來世界上凡是機器文明還沒發達的地方，都是不守時候，都是沒有時間觀念的（此點係從前由馮友蘭先生在談話時提及）。假若不知道西洋文化，我們如何能分辨哪些現象是我們可做的，哪些現象是我們可以解嘲的呢？單為樹立對於自己的文化的自信計，也需要先知道西洋文化演進的一般狀況。閉門造車的冬烘先生反而是不會有堅強的自信的。

第二，談文化，便不能忽略民族性。民族性可說是精神史上的一些元素，像化學上不可再分析的一些元素。著有「德國種族的和地域的文學史」的著者納德勒說得好，種族者是無論在生理上，精神上，心靈上不能再分析的一個單位，其帶有決定性的特徵表現在富有創造性的個人上，可視為種族的性格之代表，每在幾世紀之後，仍在同一種族中再現。他又說，種族是具一種原始天性的，此原始天性復為一地域所影響。地域是很重要的，「地域者並不是一個偶然投擲的廣場，却是一個全然一定的人類種族之營養所，之軀殼，之保障；從血統與土地而出，那最神聖的，最鼓舞的東西，昇騰在金碧輝煌的空氣之中，在精神科學裏，原來也需要一移分光術！」納德勒這話，確有幾分不可動搖的真理。只要是「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的地方，自能形成一種特殊精神的面目。文化當然有交流，但是傳統的力量也是決不可輕估的，有的人只認為文化有進化階段的不同，並沒有民族的差異，其實這是抹殺事實的。這種一偏的唯物史觀，毫無是處，一班學生尚且可以構成班風，一校學生尚且可以構成校風，為什麼一個民族，而且是數千年來「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於斯」的，難道沒有國風嗎？國風就是文化傳統，就是民族性的表現。也許民族性的構成，是靠一些偶然因素，但是既經形成之後，就有決定的力量了。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忽略的。

第三，談文化應先把握文化世界中特殊的法則。不論文化則已，論文化使須注重在精神而不單看到物質。

物質是軀殼，精神才是那意義所在。我說過，文化是人類精神活動最高的也是最後的結晶，因此談文化便只有向人類最高的活動去探求。我敢大胆地說，人類歷史的重心是文化史，而文化史的重心當是藝術史。所以然者，藝術乃是人類精神活動的頂點故。在這裏，我却不能不點明了，談文化的人必須知道文化史有一種特殊原則爲一般歷史所不能概括者。例如一般物質的進化，往往是今勝於古的，但是最高的精神活動却並不然，希臘的雕刻，文藝復興期的繪畫，屈原的離騷，晉人的書法，後人並不能超過他們。物質的進化也許是沒有止境的，是只有一個向前的方向的，精神的最高活動却可以止於至善，過此以往，却只有墮落。唐詩，宋詞，元曲，都可作如是觀。此其一。又如物質的進化是漸漸而至的，精神的最高活動的成就則往往突然而來。楚詞以前並沒有什麼好作品，但是屈原一登場就很好。古詩十九首以前並沒有好些五言詩，但是十九首一出現就很精采。這些事實的說明絕對不能以拘於物質的器用的進化的觀點來限制，此其二。再則文化雖然有過去，但是可以轉化，可以投胎轉世。例如漢人的玉器雖然不見了，但是可以轉化爲宋人的瓷（探鄧以蛰先生說）就這點說，文化的靈魂也可以說是不朽的。此其三。文化終究是有機的，它有成壞滅空，講唐詩的人曾分爲初盛中晚。其實何止唐詩？宋詞有這幾個階段，希臘雕刻也有這幾個階段（參看溫克耳曼古代藝術史）。這幾個階段就像生物的生老病死一樣的。這也是與物質的器用的進化所不同的。此其四。文化世界內之獨特的原理原則當不止此，這些原理原則如果不能把握，人便不能談文化，當然也不能談中國文化。

以上三者，都是關係智識的。

五

有這樣的態度，技術，知識，然後才可以談中國文化，否則便不能談中國文化。

從前人講治史學，須有才，學，識。後來章學誠又加上這須有史德。德是屬於我所謂態度，才和識是我所謂技術所自出，學就是我所謂知識了。不談中國文化則已，談也使需要這才，學，識，德，四者！

人類歷史雖然妄佔了不少篇幅，但除了文化史，實在沒有什麼。中國文化，自有她優異的所在，在某一時也許不為一般人所認識，但世界局面一旦真正澄清了以後，想一定有欣取其獨特價值者！也許像愛情一樣，愛的價值與其說在被愛者不如說在施愛者，了解文化亦然。了解一種文化時，與其說價值在被了解者，不如說在了解者，所以溫克耳曼，席勒，尼采，所了解的希臘文化並不同。但這何礙於這些了解者的價值？真正發現一種古代文化的完全真相也許是不可能的，只是在這發現之際，就可以表現一種發現者的人格了。就是這種發現者的人格，可以形成一運動；可以產生很大的價值。因此，了解包含一種精神上的共鳴，了解即是創造。假若中國在不久的將來，能完成一種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是對過去的中國文化有一種認識，覺醒，與發揚）時，那麼，我們對於中國這文藝復興也正是作如是觀！

三十一年八月五日，於渝郊